

# 八十回憶

(一)

## ● 孫雲燾 (國立台灣大學名譽教授、中華藥學會名譽理事長)

### 浮生八十為善最樂

我是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出生，歲月匆匆，現在已是屬於銀髮族的老人了，欣幸頭髮還是黑而且多，很不像一位年屆八十的老人。每當看到許多老人白髮盈顛，散發著銀色光輝的時候，便自然而然地從心底對他們泛出無比的崇敬。

這象徵著經歷了多少歲月，從青春到白頭，這一段美好人生歷程所表現的一面。我在七十歲以後，便仿照清代乾隆皇帝自稱「古希天子」之例，稱作「古希陶翁」，刻了一方印章應用，表示自己是一位樂觀的老人。到了八十歲的時候，又刻了一方「浮生八十」的印章，自我遣興。可惜我這年屆八十的老人，還沒有資格能稱作「皓首陶翁」，一則因為缺少那一頭受人尊敬的銀髮；再則，我有時也真顯得有點迷糊，常常忘記自己的年齡。正如孔子所說的，不知老之將至。更何況身邊還缺少一根鳩首的手杖。

想起大文豪韓愈在他所寫「祭十二郎文」中所說：「余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搖動。」我慶幸到了杖朝之齡，倒還沒有像

韓愈在他四十歲時那樣的老態龍鍾哩。

我的大哥雲鏞是一位地質學者，從他那裡，我因而知道民國初年另一位地質學家丁文江(在君)先生。丁文江是一位最有光彩，又最有能力的學人，是一位天生能辦事，能領導人，能訓練人才，能建立學術的大人物。他除了從事學術工作以外，還關心國事，發表許多政論。並且在軍閥手下做了官，在他擔任上海淞滬商埠督辦公署全權總辦的短期任內(民國十五年，公元一九二六年)就規劃「大上海」計畫。他的愛國心使他相信這個新改訂的「大上海」理想是值得努力使它實現的，也是可以逐漸實現，逐漸成為收回上海外國租界的基礎。經由丁文江的努力，且能在短短三個月內就收回上海會審公廨，再度顯現他不凡的政治和外交才能。當時江蘇省政府就上海公共租界原有的會審公廨改設臨時法庭，除照條約屬於各國領事裁判權的案件外，舉凡租界內民刑案件，均由臨時法庭審理。這實在是民國以來，我國政府能在上海租界內挽回司法主權的一件大事。綜計丁文江一生，除了他致力於地質學、地理學、礦冶學的工作外，還大聲疾呼振興科學

。不過，丁氏自己卻有項可笑的迷信。他說他家族裡的男性族人都沒有活到五十歲的。所以他要在有生之年，用拚命的精神來努力工作，期於短短歲月裡，放出燦爛的光和力出來，為社會國家多做一點事情，才不辜負此生。不幸他的預言果真言中，這一代哲人祇活了四十九歲。胡適之、傅斯年、朱家驊、翁文灝諸位都對丁文江非常敬重。丁文江自己沒有寫過傳記，還是胡適之先生後來在丁文江逝世廿五年後才寫了一本「丁文江的傳記」(民國四十五年初版，中央研究院印行)來紀念這位哲人。我們可以從那本傳記裡更能瞭解丁文江的為人。

### 雪泥鴻爪留點痕跡

臺灣在光復之初，祇有醫學教育，而沒有藥學教育，國立臺灣大學於民國四十二年在醫學院裡成立了藥學系。我在藥學系創辦伊始，就參與籌畫工作。隨後在校連續任教整整卅年，直到民國七十二年退休，可算得和台大藥學系淵源深厚。台大藥學系到民國八十二年屆滿四十週年，在校師長、同學和畢業校友們都有意為這個不算長

，也不算短的四十週年系慶來慶祝一番。他們因我出生在民國初年（二年），差不多與民國同壽，經歷了八十年的歲月，對於民國以來，政局的變遷，社會的轉型以及有關教育和藥學發展情形種種，要比他們知道得多一點。所以我希望我趁著台大藥學系四十週年系慶的時候，寫一本傳記一類的東西，讓大家看看。我對寫傳記的事，實在不敢貿然答應。

我國文人，自陶淵明的「五柳先生傳」始，常好自寫傳略，藉以遣興。西洋文壇寫自傳的風氣也很盛行。我知道胡適之先生常勸人寫傳記，可是他自已祇在早年寫了一本薄薄的「四十自述」。後來的胡適傳記還是別人替他用口述傳記的方式寫成的。我原對寫傳記的事不敢承諾，後來經一再考慮，想到試寫一本「八十回憶」也未嘗不可。因為我有時和同學、朋友們談天，講些過去的經歷種種，大家也會感到一些興趣。我想到蘇東坡居士的一首詩，是這樣寫的：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

我想，就寫一篇「八十回憶」小品，作為我經世的雪泥鴻爪，在我們這塊美麗的土地上留點痕跡吧。

## 不求聞達淡泊一生

我是民國二年（公元一九一三年）出生。民國二年出生的人屬牛。一想到屬牛，真感覺自己帶有一些牛脾氣。從小到大，每當看到牛隻（水牛），就有一種親切感。看到它們踏著穩重的步

法，任重道遠的姿態，特別是在夏季大熱天時候把身子浸在水塘裡那種悠閑的樣子，真教人羨慕。我不要被莊周（莊子）那樣幻想著自己會化作蝴蝶在天空中自由自在飛翔。我想還是像水牛一樣吧，默默地耕耘，不求聞達，不求財富，悠閒地過著淡泊的一生。

按照西方占星術的說法：依照一般人的出生日期，規畫為十二個星座，我出生在癸丑年六月廿一日（陰曆），乃民國二年七月廿四日（陽曆），應屬獅子星座。照一般說法，屬於獅子座的人在性格方面有明朗的個性，充滿男性活力，意志強，感情熱烈，勇敢，有俠義心。對於錢財方面較為慷慨大方，不重視金錢。對於事業方面，富於領導才能，認真負責，可以居於領導地位。我考量我的性格，覺得在某些地方，倒也和獅子星座的人有些相似之處。

我們都相信，一個人的個性和血型有關。我的血型是「O」型。據說「O」型的人具有的氣質是個性強，不大肯認輸、認錯。肯努力進修，求充實和進步，喜歡教育或教訓別人。由於個性率真衝動，所以作事有點我行我素的傾向；但也喜歡社交活動，重視人際關係。為人處世能憑理性去分析判斷，訴諸理智，所得結論卻比較可靠。我從血型方面，多少瞭解我的氣質和個性。有時對各種問題的處理，總慎重將事，秉持著孔夫子的訓示：從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後篤行。同時也想學習「AB」血型人的做法：多聽取各方面的分析，然後再作最後抉擇。話雖如此，可是有時感情激動，失去自我節制，也就不能自

己了。

## 誠惶誠恐不伎不求

一個人的性格受遺傳的影響較大，當然，血型和遺傳有關。其次，受家庭、教育或閱讀的影響也是不小。再其次就看他對社會環境如何去適應。進入社會，接受多方面挑戰，能夠成功或者挫敗，那就要看他如何去應付了。個人的思想和觀念，也可能受到宗教的影響，或者是生命歷程中受到嚴重的挫折而有所省思。像浮士德主人翁老來不甘寂寞，為了要滿足自己的貪婪慾念，不惜去和魔鬼打交道，結果出賣了自己的靈魂，追悔無及！

我喜歡在空閑的時候，坐下來品品茶（可惜我不會抽菸），回憶一些往事，想想究竟對過去的那些事情是做得對，那些事情是做得不對！在自行反省中，有時實在也弄不清楚自己，竟然會有一種充滿矛盾的性格存在。譬如有關自己的事情，往往猶豫不定，顯得軟弱，遇有困難的時候，總覺得難於啟齒去求人。可是關於公益的事，我也不知道那裡來的勇氣，卻會顯現得剛毅，不畏艱鉅，努力以求其成。再有，我平常對人謙和，可是遇到有人對我不豫時，倒也不甘示弱。

我在政府衛生界服務十二年，先後在學校任教三十年，其間曾出任聯合國技術援助總署駐伊朗藥學顧問一年，這些工作，我都沒有自己去謀求，全是被徵召性質，一路誠惶誠恐地去做事；祇想把自身所擔任的工作做好，也從沒有去謀求另外一些較高、較好的職位。這大概就是所謂士



① 孫雲燾教授（右）與總統府資政何宜武教授（左）合影。

② 作者孫雲燾（右二）代表中國藥學會參加荷蘭海牙國際藥學會

（FIP）理事會。



大夫的「不忮不求」態度吧。因此個人就顯得相當惰性和保守。對這樣人生觀的評價如何，我自己實在也弄不清楚，還是讓別人來評論吧。

### 信仰儒道崇尚真理

有外國朋友問我有什麼宗教信仰，我告訴他們我是一位「自由思想者」(free thinker)。他們起初聽了很為驚異，後來經我解釋：我信仰的「儒道」，雖沒有宗教的形式，但是崇尚真理，遵守著「道德規範」(code of ethics)這也是許多宗教如天主教、基督教、佛教、回教的教義裡所標榜著要遵守的原則。一個人要能明辨是非，要說公道的話，做合理的事；忠於國家，尊敬父母師長，對兄弟姊妹親愛友恭，對配偶敬愛，對朋友講信義，對子女後輩愛護提攜。我們做好事不是為了想進天堂，不做壞事也並非怕入地獄。憑著良知做事，自然能夠心安理得。在漫長的人生旅途中，要經歷大大小小多少磨難和險阻，能經得起考驗，才能立定腳跟，不致跌倒。像唐代玄奘法師發願前往天竺取經，經歷了虎豹、魔鬼、妖精種種劫難，再經梯山、棧谷、繩行、沙度之險，忍受著身熱、首痛、風災、鬼難之苦，堅忍不拔，終於到達了西域，在精研梵文後，取經而回，完成了偉大的使命和任務。孔子是一位聖者，他談他自己修身的歷程，從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到七十才能隨心所欲，不踰矩。可見我們要自行管束自己，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的家庭和一般中國家庭一樣，累世都信奉

佛教，好像佛教是我們的國教一樣，但並不沉迷於佛教。我父親是一位讀書人，可說是比較崇尚著「禮數」。我從小隨著家人一齊拜佛。長大以後，有機會也喜歡走進寺廟，或者教堂裡去，在莊嚴肅穆的氣氛中，來淨化一下靈魂。我在名義上雖沒有信仰什麼宗教，也不屬於任何宗教，可是在我的心目中，自有著「信仰」，這樣才能成爲一個俯仰無愧，有操守，氣節的人。

### 回國服務艱苦備嘗

我的一生，可算過得平平庸庸極爲尋常，從來沒有經過什麼大風大浪。首先，我覺得很幸運能出生在一個中等家庭，所以在早年求學時期，沒有受到貧困之苦。在民國初期北洋政府時代，由於軍閥把持的局面，北方戰禍頻仍，我們遠在江浙一帶，沒有受到什麼影響。等到民國十七年革命軍北伐成功，國民政府奠都南京以後，政局才算安定下來。民國二十三年我在上海中法大學藥科畢業，應邀在國民政府衛生部實習半年，衛生部長劉瑞恆博士對我們剛畢業到部實習的學生非常愛護，是我畢業離校後遇到的第一位好長官，在衛生部實習半年之後，繼續補習法文，幸得學校資助於民國二十五年前往法國繼續深造。民國廿八年(一九三九年)七月在里昂大學獲得藥學博士學位後，當時便有兩種選擇：一是留在法國繼續學業或做事，另外便是回國服務。當時歐洲國際局勢緊張萬分，德國積極備戰，眼看歐洲大戰就有一觸即發之勢。如果歐戰一旦爆發，正不知何時才能結束。我國對日抗戰早在民國二十

六年就已開始，大陸沿海地區雖然失陷，但政府遷都四川重慶大後方，領導軍民，繼續堅苦奮戰。在這關鍵時刻，我自應返回自己的國家，爲苦難的祖國做點有意義的事情。經一再考慮，便決意預訂九月一日的回國船位。不料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於在九月一日爆發了。幸而我們搭乘那艘郵輪能在九月三日離開法國馬賽港口，經過地中海、蘇彝士運河、印度洋，安全回到上海(那時太平洋戰爭還未發生)，可算是從戰爭的邊緣逃離了出來。回到上海以後，幫助同學朱文馨兄創辦光明藥廠，隨後便回中法大學藥科任教，也算是對母校的回饋。

在中法藥科任教一年後，衛生署便徵召我到大後方去服務，擔任衛生署第一製藥廠和麻酔藥品經理處的藥品製造工作。當時儘量利用內地的資源，在簡陋的機械設備下，竟然製造了近百種原藥和製劑，對前後方醫療藥品的供應，作了相當的貢獻。尤以所製麻酔藥品和一切消毒殺菌藥品對於病患止痛和救治傷患，格外顯得重要。想到那一時期的工作，真是艱苦備嘗，在我這一生中確是值得永遠懷念的。衛生署長金寶善博士，是徵召我到衛生署去服務的長官，關於劉瑞恆和金寶善兩位難忘的長官，容當另文詳爲介紹。

民國四十二年國立臺灣大學在醫學院內成立藥學系，我就受聘擔任教授兼系主任，進入我另一個階段的教書生涯。不想一待就是三十年，直到民國七十二年退休爲止。我常想這也許是命中注定的吧！

當民國二十九年我在上海中法藥科任教一年，

就被衛生署徵召去大後方從事製藥工作，一直到抗戰勝利還都，然後播遷來台，一共做了十二年的公務員。在這期間，雖有二次去藥學校教書的機會，但都沒有成功。不料到民國四十二年卻被徵召到台大任教。可算是從學校出去了十二年，又再次回到學校來，這豈非命中註定！

民國三十八年我隨同衛生署播遷來台時，把中國藥學會的大印從大陸帶來台灣向內政部登記重組中國藥學會。後來經大家推選我擔任中國藥學會理事長多年。

我們集聚藥學界大家的力量努力推展會務，

倒也做了許多有意義的事情，其中重要者如促使台灣大學成立藥學系，協助衛生署編著及刊行第二版及第三版中華藥典以及促進國際學術交流等等。

### 知足常樂享受人生

我來台灣以後，便展開我生命史上另外的新篇章，也是我下半輩生命中重要的一段歷程。當我在民國七十二年從台灣大學退休的時候，真是感慨萬千！覺得多年來對藥學教育的理想，還有許多地方尚未能達到。今天整個世界局勢在改變



德八贈頒教育部接受民國七十二年教授雲孫作者  
時留影。

中，藥學的形態也跟著時代在改變。從過去的注重生藥學、藥化學以及藥劑製造，進而需要加重生物藥學科技 (bio-ph armaceutical sciences) 臨床藥學 (clinical pharmacy)，社區藥局服務 (community pharmacy service) 以及食品衛生 (food analysis) 等新學科的發展，才能趕得上時代需要。看看我們今天的藥學教育，表面上看來，藥學校的數目不能算少，藥校學生也在激增；可是在實質上還不是仍舊停留在公元一九七〇年的階段？轉眼廿一世紀即將來臨，我們要怎樣努力才能趕得上時代潮流？面對將來，能不去注重有關生物科技 (biotechnology) 和分子生物科學 (molecular biological sciences) 方面的新知識嗎？

曾有人評介國畫大師張大千兩句豪語，說他是「富可敵國，貧無立錫」。我很同意這樣的說法。我在銀行裡雖無大量存款，而且還負債，可是我覺得還是很富有。我平素喜歡穿著整齊，講求美食，旅行時要住高級旅社。這一切的一切，都是從前士大夫觀念在作祟，我又何能擺脫這種虛偽觀念的束縛哩？

我有許多政界、企業界、學術界各方面的朋友，在他們面前，我從不自卑。我走過國內許多大城市，世界各國的名都大邑，現在我有一所可蔽風雨的住所，壁架上有許多圖書，還有一些癖好收藏。我擁有一個「名譽教授」的頭銜，桃李滿天下，夫復何求？古人說：知足常樂。我要好好地悠閒地享受一下這美好的人生，不要讓大好時光溜走了。(未完待續)